宁夏英烈故事

冯中江：青春铸军魂 热血报家国



冯中江。

冯中江，1966年10月出生于宁夏中卫县镇罗公社（今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九塘村。

冯中江上学时就是一名爱学习、爱劳动、助人为乐的好少年。1980年夏天，一场暴雨使村前的马长沟洪水横溢，泥沙翻滚。一个5岁的小男孩不慎掉入沟里，在洪水中拼命挣扎。危急时刻，路经这里的冯中江毫不犹豫跳进水中，经过20多分钟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14岁的冯中江见义勇为的行为受到乡亲们的称赞。1982年，冯中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2年时间里，冯中江与父亲靠买来的一台手扶拖拉机走南闯北跑运输、做生意，很快就积攒了2万多元，家里的日子也富裕起来。1984年11月，正是家里日子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冯中江毅然报名参军。父母最初不理解，但他说：“家富不能忘记报国，好男儿志在四方，参军能锻炼自己，能得到金钱换不来的东西。”

入伍后，冯中江被分配到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炮兵团四营二连当上了一名炮兵侦察兵。他刻苦训练，在全团侦察兵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后来又成为兰州军区炮兵侦察兵的尖子。在兰州军区组织的炮兵侦察兵尖子集训班，军事指挥学院的一名资深炮兵老教员与尖子兵分组进行比赛，在与冯中江比赛时，两人都不用测距机，先后用望远镜和手指测距，得出的结果不分上下，教员连连说：不简单，不简单。

1985年底，冯中江随部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到达前线后，他4次向营连领导请求到最危险的营前沿观察所执行侦察任务，常冒着生命危险抵近目标侦察。一次，在前沿阵地侦察，班长和他发现前方有一排敌军炮管。为了探清虚实，他穿过开阔地爬向一片野草丛，架设器材观察，班长看这样很危险，命令他回来，但他硬是用剪刀将遮挡视线的野草剪出两条宽1米、长10米的观察通道，看清了刚才发现的目标原来是伪装的，而在左右后方1000米处，才真正隐蔽着3个重型目标。他立即报告，火炮精准摧毁了敌大炮7门，引爆弹药10堆、粮库1座。

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冯中江把夜里测得物体的坐标记下来，白天再测；再把用仪器测得的数据和目测数据比较。经过刻苦努力，他的侦察技术更加过硬。他还总结出“晴易近，阴易远，雨雾浓时应减半”的经验口诀，战友们夸他是炮兵的“千里眼”。冯中江经常说：“侦察兵就是炮兵的眼睛，就是指挥员的眼睛，只有练就一双穿云破雾的千里眼，才能完成好战斗任务。”当战友们问他是不是想当侦察英雄时，他说：“就是的！我想当个英雄，战争需要英雄，我们宁夏也需要英雄！自治区领导来信说，要编写英雄谱，希望在书上见到我的名字呢。

1986年6月15日17时30分，班长传达上级的指示：“兄弟部队主力受到敌炮火阻击，伤亡严重，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查清敌火炮阵地的坐标。”敌人的炮弹已经向我方阵地纵向延伸，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炮弹炸起的泥土不时飞到战士们的脸上和身上。为了严密监视敌人活动，准确判断敌炮兵阵地位置，冯中江不顾随时会被炮弹击中的危险，凭着熟练的侦察技术，迅速选择了观察位置，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军炮兵的活动情况。他看到敌军的一长排大炮正在向我方阵地射击，突然从草丛中站起来，向战友发出了射击指令，战士李涛正要把射击指令通过电台传递给指挥所，冯中江忽然听到刺耳的啸鸣声，忙喊：“不好，是炮弹。”并立即扑到李涛身上。敌军一发炮弹落在冯中江身后2米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推出5米多远，头部、臂部等部位负伤7处。由于冲击波挤压胸部，造成内出血，经抢救无效，冯中江光荣牺牲，年仅20岁。冯中江牺牲后，部队党委追认冯中江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20日，冯中江的骨灰由老山前线运回故乡。中卫人民在九塘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7月1日，中卫县委、县政府作出向冯中江学习的决定，还在他家大门挂上“人民功臣”的匾额。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宁夏革命的影响



玉皇阁北街，中山日报社旧址，宁夏地方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

1927年5月的一个夜晚，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李临铭骑马撤离银川。他已奔至盐池境内，眼看快到陕西省定边县了，但还是被后面的追兵赶上，抓住一顿毒打后，以为已经死去，便将“尸体”推下山沟。第二天，李临铭苏醒过来，忍着伤痛，历经千辛万苦，逃到定边县，经人介绍在定边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继续坚持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共定边党支部。

这件事的起因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宣誓就职。同时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也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总司令。这时的冯玉祥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拥兵10多万，占据陕、甘、豫和包头地区。冯玉祥就利用这两个总司令的头衔，分别同宁（南京）、汉（武汉）国民政府打交道，先与汪精卫、唐生智召开了郑州会议，力主停止宁汉之争，之后到达徐州会晤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会商“分共”和宁汉合作问题。然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攻击工农运动，催促汪精卫和蒋介石通力合作。这就是宁汉合流，实际上是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合流反共。

冯玉祥开始在所属部队进行清党，即在国民军中进行驱逐共产党人的“清党肃军”运动。他先送走所属部队的苏联顾问和政治部长刘伯坚，随后将独立团和各部队科级以上政工人员中的共产党员送到郑州集训。在郑州集训后，很快又转往开封集训。集训处有士兵守卫住处，不许集训人员自由出入。冯玉祥每周训话两次，一再表示他跟共产党走错了路。经过一个多月的集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冯玉祥便将他认为不可靠的人员都遣散。刘志丹也被送去集训，被遣散后，改名化装，潜回郑州，密见马鸿逵，请他帮助返回陕北。刘志丹曾在马鸿逵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处长，因工作出色受到马鸿逵的重视。马鸿逵当即赠送二百元路费，并派亲信马全良送刘志丹过黄河，转回陕北。这时冯玉祥开始在豫、陕、甘三省推行“严防共产党办法”，到处演讲共产党之错误和鲍罗廷手段之恶劣，“以期唤醒民众免入歧途”，并下令通缉共产党。在兰州的中共党组织遭到刘郁芬的破坏，有20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通缉令到达马鸿逵的手中时，刘志丹已脱险。马鸿逵后悔帮助刘志丹，后来提到这件事情说：“及今思之，不若羁留我军中，慢慢施以感化，转变其思想，使为我用，或径以共党罪名，予以处决，以免其附共作乱之为患也。”

西安警备司令部也接到冯玉祥训令，发出严禁共产党活动的命令，银川地区开始进行“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去了西安，中共党员郭伯瑞回山西榆次。中共党组织决定由没有暴露身份的贾一中领导宁夏地区的工作。贾一中以高小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但不久即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发现，令其限期离境。同时，马云堃也被驱逐出境。当时已到寒冬，贾一中、马云堃没有回家的路费，师范附小教师张得志资助了路费，并送至银川城外，帮助他们安全离开宁夏。至此，中共在银川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宁夏特别支部停止活动。

（据银川党史）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的运作机制（下）

邮路网络与运输调度机制

通讯站的邮路网络以延安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覆盖陕甘宁边区主要区域的通信网络。建站初期，共开辟了4条干线邮路：延安至绥德、延安至安定、延安至关中、延安至庆阳，分别指向北、东、南、西4个方向，构成了最基本的骨架。在此基础上，又设置了14条支线，连接各县及重要乡镇，如绥德至吴堡、曲子至马渠、庆阳至华池、安定至盐池等。后期干线邮路发展到8条，邮路总长度达到5080公里。邮路网络的设计体现了分层递送的理念。干线负责连接延安与各专署所在地，支线则从分站、县站延伸至更基层的联络站。这种树状结构使得邮件可以在不同层级之间分段转运，既避免了单个通讯员长途跋涉的负担，又保证了信息的逐级覆盖。到通讯站后期，其邮路已经北至神府，南达淳耀，西通庆阳，甚至还与晋西北根据地建立了通邮联系，基本上将边区的政治中心延安与各县、主要口岸连接起来。

班期制度是邮路运营的核心管理手段。干线邮路实行逐日班，即每天发班一次，确保重要信息能够及时传递。支线则为间日班，隔天发班一次，以节约人力。1942年，通讯站又开办了昼夜兼程的快班，用于紧急文件和重要信件的快速投递。1943年，延安至绥德干线改为逐日双人班，两人结伴同行，既可分担邮件重量，也能在路途中相互照应，提高了安全性和投递效率。这些班期安排的差异化设计，反映出通讯站在有限资源下对不同类型邮件的分级处理意识。

运输方式的选择同样体现了务实原则。通讯站成立初期，信件和报刊数量不多，通讯员通常将邮件用包袱捆好背在身上即可上路。随着业务量的增长，一些邮件较多的线路出现了用扁担挑运的方式，尤其是当有零星包裹时，通讯员像挑夫一样挑着两个邮包翻山越岭。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讯站全部依赖人力步行完成投递，这种原始运输方式固然是物资匮乏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但也恰恰说明通讯站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维持运行的坚韧程度。

邮路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1941年后，国民党加强对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日寇也频繁对边区进行扫荡，邮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通讯站通过调整班期、增开双班、优化线路等措施，尽力保持邮路畅通。例如，延安至庆阳线经过整顿后开通了日夜快班，延安至关中马栏邮路也进行了优化改造。这些动态调整表明，通讯站的邮路管理并非僵化的制度执行，而是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业务运行与邮件处理制度

通讯站可收递的邮件类型涵盖普通信件、公务文件、报刊读物、挂号信函及加急信件五大类，汇兑业务、包裹及各类实物不在其受理范围内。尤为特殊的是，所有邮件均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一免费原则与当时中华邮政的资费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边区通讯站作为战时公共服务机构的根本属性。

业务量的增长是通讯站运行成效的直接反映。1938年5月通讯站成立后的一年间，全站每月收送及转口信件总数从1139件增加到33459件。1939年全年共收发平信19.3万件，挂号信1.98万余件。1941年邮件数量进一步激增，仅1月至8月，寄递的平信、文件、书报及各类挂号邮件合计已达数10万件，若将转口邮件计算在内，总数更为可观。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的三年间，通讯站共寄出各类邮件约80万件，其中平信占第一位，约55万件，政府文件居第二位，近18万件。

邮件数量的持续增长推动了单位投递成本的大幅下降。1938年单件邮件平均投递成本为1角，到1939年3月已降至4分3厘；三年累计运营总支出为7.1万元，单件邮件平均成本不到9分钱。成本下降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邮件总量增加摊薄了固定成本，二是边区推行的简政整顿举措有效提升了通讯站的整体运转效率。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行模式，在战争环境下显示出独特的制度优势。1940年，周恩来题词赞誉邮政事业为“传邮万里 国脉所系”。

邮件处理制度建设是通讯站走向规范化的关键。在长期实践中，通讯站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发管理制度，采用寄单、挂单、排单、书单、投递单等多种凭证，对邮件揽收、中转、妥投各环节进行登记和核对。这套单据管理系统的建立，有效减少了错发和积压现象。从数据来看，这套邮件处理制度推行前每月错发邮件可达数十件，而1944年1月至10月累计错发量仅为10余件。可见，邮件处理制度的有效推行不仅提高了投递质量，还推动了邮件数量的增加，在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

通讯站与中华邮政的关系也影响了其业务运行。根据暂行章程的规定，边区寄往国统区的邮件委托中华邮政代为投递，寄件人需按照中华邮政资费标准自行粘贴足额邮票，通讯站负责将此类邮件统一送至就近的中华邮政网点；国统区寄往边区的邮件，则由通讯站负责完成境内的传递工作；通讯站本身不代售中华邮政的邮票。这种安排既避免了切断边区与国统区之间的邮务联系，又保障了通讯站作为独立系统的自主性。1942年，国共双方就通邮问题达成协议，边区与国统区的通邮状况一度大为改善，延安邮局接收的外来邮件、包裹数量显著增加，挂号信也比前一年同期多出10余倍。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国共摩擦升级后，通讯站逐步采取措施限制中华邮政在边区的业务范围，例如明确规定边区境内所有邮件统一由通讯站收寄，国统区寄往边区的邮件全部交由通讯站中转配送。1944年，通讯站在延安增设三个代办点，专门承接边区各机关寄往国统区邮件的转递业务，切断了中华邮政与边区各级机关的直接业务往来。这种业务上的博弈，客观上巩固了通讯站在边区邮政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提升了战时通讯的保密性。（据《团结报》）

